

创造世界公路史上奇迹的“两路”

□ 崔禄春

1950年4月到1954年12月，11万藏汉军民历时4年多，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施工条件最为艰苦、总长达4360公里的康藏公路（1955年改称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孕育了伟大的“两路”精神。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任在“两路”建成通车6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概括了“两路”精神的科学内涵：60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强调新形势下，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2021年，“两路”精神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修筑两路既是解放西藏的现实需要，也是长期建藏的必然要求。两路修通之前，西藏运输靠牦牛、靠人背马驮，人只能靠步行。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只有拉萨城内从布达拉宫到罗布林卡一条短短的、勉强可以通汽车的土路。因此，修筑进藏公路成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头等大事。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决策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决定向西藏修筑公路，并规定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方针。已经进驻拉萨和西藏各地的部队、工作人员在粮食、物资补给上遇到极大困难，打通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通，就成为落实好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脚跟的首要问题。两路是解放之路、统一之路，也是西藏人民的“幸福路”、中华民族的“团结路”。

“两路”精神孕育形成于两条公路的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要在“人类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上修路，基本的钢材、炸药都供应不足，甚至连木材都短缺，地图、水文地质资料图等开路资料几乎为零，难度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在党的领导下，11万筑路大军迎难而上，修通了两路，结

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两路宛如两条洁白的哈达，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大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两路”精神得以形成。

“两路”精神根植于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路筑路大军跨怒江、攀横断、渡通天、越昆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革命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信念，是不畏强敌、勇于胜利的风骨，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还有熔铸于血液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品质，“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之人皆相爱”的传统美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韧斗志，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深映射在“两路”精神当中。

“两路”精神发扬于“两路”的养护过程。两路通车时只是最简单、最基础的路，川藏公路号称公路地质灾害的“博物馆”“百科全书”，极易出现滚石、滑坡等险情；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原冻土、风雪交加经常阻断交通。7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100多亿元对两路进行大规模改造，实现了全部黑色化。西藏、四川、青海三省区和武警交通部队组建专门养护机构，保障了两路畅通。著名的唐古拉山“天下第一道班”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海拔5231米的山口，他们用生命守护天路，用善举帮助路人。这里年平均气温零下8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40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一半，一年中有120天以上刮8级大风，这就是道班工人的养路环境。他们喊出了“养路为业、道班为家、人在路上、路在心上”的口号。

“两路”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极为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这24个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铿锵，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有着极为丰富深刻的内涵。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两路”精神的灵魂。两路修筑何其难，靠的就是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这个口号，最先是由18军某部二连官兵在修筑康藏公路敏拉山皮康崖段时提出来的。当地老百姓说，“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但筑路战士们说，“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徒手攀上悬崖峭壁，从崖顶用绳子吊着人悬空打炮眼，终于凿出一条仅容纳一只脚的小道，逐步拓展终于在这段悬崖上修出了公路。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后，“两不怕”精神传遍全国。在两路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勇士把自己的身躯化作了筑路的基石；在通车后的70年里，300多名汽车兵长眠于雪山冻土之中。被称作“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是修筑青藏公路的总指挥，将“慕生忠之墓”5个字，刻在了自己使用的铁锹把上。他告诉大家，如果他死在了这条路上，这就是他的墓碑。

顽强拼搏、甘当路石是“两路”精神的精髓。顽强拼搏彰显的是两路建设者和守护者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面貌，甘当路石体现的是公而忘私、乐于奉献的精神境界。川藏公路通车的关键一是翻越6000多米的雀儿山。当时由于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加上没有经验赶工期，牺牲了300多名战士，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这对战士们士气影响很大。政委魏明德带领战士们进行了反思，认为不管季节只是按照路线向前修，冬天工期刚好赶到雪线以上了，结果恶劣的气候导致了人员伤亡率高。经过反思研究，大家用一个很简单但又比较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在修路过程中不要按部就班地推进，而是在夏季抢修雪线以上的路段，冬季

陕西省佳县是革命老区、颂歌《东方红》的故乡，1947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来到佳县战斗生活了100个日日夜夜，指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0月18日，毛泽东为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他唯一一次给一个县委题词。

70多年后的2021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期间，专门前往中共绥德地委旧址，深情回顾这段厚重的革命历史，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有着重大教育意义。这与毛泽东的题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再次宣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人民立场。

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毛泽东在佳县期间，始终心系群众，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要爱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主动帮助群众干农活。在朱官寨居住期间，毛泽东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有一次毛泽东外出散步，正遇警卫部队吃“钱钱饭”，这是陕北的一种用小米和黑豆片熬成的稀饭，但因遭灾缺粮食，战士们吃的实际上是米糠、秕谷、瓜菜和黑豆片熬成的糠菜糊糊。毛泽东让战士们给他盛了一碗，一边吃一边说“这饭好吃！”回到窑洞后，他吩咐管理员：“以后就给我吃老百姓和战士们吃的那种钱钱饭吧！”管理员想方设法为毛泽东弄小米，毛泽东严肃地对管理员说：“还是给我吃‘钱钱饭’吧！老乡们都吃不上小米，机关部门也吃不上，我为什么要那样特别呢？老百姓这样苦，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干部群众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将节省下的小米、红枣等送去，都被毛泽东婉言谢绝，并一再叮咛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要尽最大努力，想办法安排好群众生活，组织好生产。”

在神泉堡住下没多久，天降早霜，庄稼未成熟就被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指导九支队的干部战士帮助农民抢收庄稼，还把灶上省下来的3斗9升麦子送给19户没有麦种的军属和贫下中农，先后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神泉堡家家户户都称赞九支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一首陕北民歌《咱神泉来了九支队》从这里唱响：“红天红地红霞飞，咱神泉来了‘九支队’，多少代，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去担水，天不明又上山把庄稼灌。忙让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把麦枷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

全力支持中国革命

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人民军队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当“官”和“老爷”，深入基层，“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解放战争期间，佳县人民把自家口粮两次送到攻打榆林战斗的前线，组织300多副担架护送伤员，跟随西北野战军1个月，全力支持人民军队。特别是党中央转战陕北佳县期间，佳县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前线，拿出最好的保命口粮给部队吃，腾出最宽敞的窑洞让解放军住，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党中央安全。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移到佳县朱官寨，这是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为了在国民党刘戡部逃跑前再打一仗，毛泽东约见张俊贤，周恩来问：“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不够用？”张俊贤坚定地说：“够，我们佳县叫胡宗南害苦了，佳县人民决心全力支援前线，消灭敌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支持得住。”接着又说：“我们在通秦寨和车会还有两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并表示还可以把羊、驴和牛杀掉支持战争。毛泽东严肃地说：“把驴和牛杀了，明年老百姓耕地怎么办？”张俊贤说：“解放前，我们穷人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 姬跃飞

“有这样好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佳县期间公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很快在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并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和群众基础。同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包括“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等内容，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他还审定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突出了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等反映人民需求的内容。同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发布，其中“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等内容与人民密切相关，充分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10月17日，毛泽东来到佳县城，向张俊贤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等情况，听取汇报后，毛泽东深情地说：“有这样好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随后接见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的同志，勉励大家继续搞好土改和支前工作，为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

10月18日，张俊贤请毛泽东为佳县县委题词，留个纪念。面对如此伟大的人民，毛泽东欣然答应，挥笔在三尺漂白布上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这是毛泽东对佳县人民的最高褒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也深刻表达了毛泽东对全党的殷切期望。

勇闯新路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 关正标 汪 勇

1978年冬，小岗村率先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成为“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中国的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包干到户”之所以能够首先诞生于小岗村，既有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的政策安排，又源于小岗村有着一群勤劳质朴，敢闯敢干的“大包干”带头人。

穷“灰”掉的小岗村

1978年前后，安徽凤阳县办公室电话报如雪片般飞来，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处理来自江浙沪的同一要求——立即派人把凤阳外流人员接回去。号称“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穷”得出了名，外流人口遍及大半个中国。在凤阳县，小岗村更是最贫穷的偏远村落之一，用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话说，已经穷“灰”掉了。

为了拔掉穷根，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生产方式，开展生产自救。1954年，在凤阳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凤阳城西乡党支部创造了“包工制”，即党支部6名委员实行包社、包队、包组责任制，在分配上采用“土四劳六”的比例进行秋收分配，积极推广小麦优良品种，获得了大丰收。毛泽东肯定这个支部的工作路线正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这个“包工制”和1978年的大包干都采用了“包”的方法，区别只在于“包”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可以说，“包工制”是大包干产生的种子。

1977年6月，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万里在滁县地区主持召开安徽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座谈会，并于11月印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

再开个社委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

三位队干部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并决定于12月初的一个晚上秘密召集全队各户当家人到严立华家开会，然后就分头通知各户户主。就在这个会议上，小岗生产队的18个当家人，做出了“分田到户”的历史性决议。小岗村包干到户诞生了。为明确责任共担风险，这18位农民在一纸契约上立下了军令状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形成如下规定：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的这一纸契约催生了我国农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包干到户后，小岗人将下地干活当成一种无比幸福的事情。小岗人不再集体出工的反常表现被公社书记张明楼发现并上报县委。1979年4月10日，陈庭元到梨园公社调研时，张明楼把小岗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陈庭元听完后，亲自来到小岗生产队调研，并将小岗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带回县委研究。4月15日，陈庭元再次来到梨园公社，将县委意见交代给张明楼，“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莫过于多收点

